

从微观到宏观 :历史人类学视角的转变

陆 启 宏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摘 要 :人类学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历史学 研究领域和微观视角。其中微观视角给历史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但同时也带来了碎片化的问题。本文分别从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考察历史人类学如何将微观视角和宏观视野结合起来 ,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派和历史学中的全球微观史都试图通过全球视野来理解地方史 ,以克服碎片化的问题。

关键词 :微观史学 ;政治经济学 ;全球微观史

1981年夏秋的两期《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以“新史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以后”为题 ,对诸多历史领域的新发展进行了讨论 ,其中有一组文章的主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人类学和历史学”。其中最后一篇的作者是意大利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 ,他在这篇简短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对历史人类学的看法。金斯伯格认为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是基于两个危机的影响 :“关于历史的一种结构的、自信的观念的终结 ,人类学家日益意识到土著文化自身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人类学在两个方面影响了历史学 (1)研究的领域。金斯伯格指出人类学对于历史学家的影响在于“对文化差异的重视 ,以及通过强调那些迥异于我们的社会中各个方面的内在一致性来克服它(文化差异)的努力” ;历史学家试图“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旧的主题(如政治权力)和旧的证据(如审判记录)” ,因此“传统上被视为无意义的、不相关的或至多是不重要的奇闻异事的行为和信仰(如魔法和迷信)被作为有意义的人类经验加以分析”。(2)微观的视角。研究领域的变化在历史研究中形

成了一种新的呈现证据的方式 ,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人类学中个案研究的影响。人类学中的个案研究在历史学领域的体现即是微观史学。微观史学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有很大的相似性 ,微观史学家“通过历史资料的重新挖掘和整理 ,运用大量细节的描述、深入的分析重建一个微观的个人、家族或是社区”。

卡洛·金斯伯格本人的史学研究正是人类学这种影响的最好体现 ,他将微观史学运用于意大利近代早期异端和巫术的研究中。金斯伯格认为 ,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流有助于两个学科的发展。他在文章最后也提到 ,微观史学由于受到人类学个案研究的影响会产生碎片化的问题 ,但他认为“这是为了制作更为有力的分析工具而必须付出的代价”。

但这真的是“必须付出的代价”吗 ?我分别从人类学和历史学两个方面考察历史人类学如何将微观和宏观结合起来 ,以克服碎片化的问题。

一、人类学研究中的宏观视角

作者简介 :陆启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史学博士。

Carlo Ginzburg,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Past]: A Comment',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12, No.2 (Autumn, 1981), 277. 277. 277. 278.

周兵《新文化史 :历史学的“文化转向”》,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89页。

个案研究是人类学(尤其是民族志)的一个主要特点,如人类学家玛丽莲·西佛曼和菲利普·格里福所言:人类学家独特的(也似乎有点神经质的)选择比较小规模地点,理由之一可以简明的总结为“脉络化”和“全面性”。这三个关键方面。首先,对小范围密集的集中注意力,可以对所要分析的现象有深刻的了解,而这也是研究真正的目的。这让学者在探讨社会政治模式、经济情况和文化信仰间的相依性时,可以将“真实的人们”也包括进去。其次,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地点,只要按照适当的过程、网络或限制,人类学家可以由这一特定地点向外扩展到一个更广大的地区。第三,人类学对于小地点的使用,可以用来提供对现象的解释。

对于小地点的关注也成为针对微观视角的一个主要的批评,认为个案研究不具代表性。格里福在一篇研究爱尔兰东南部的汤玛斯镇的商店主和农民的文章中也承认,他所研究的汤玛斯镇并不是“所有小市镇的典型”,在汤玛斯镇所做的个案研究的结论也无法应用到整个区域,“更别提应用到整个爱尔兰”。尽管如此,事实上在当代的人类学研究中,“小地点”通常是和“大问题”联结在一起的,如西佛曼和格里福所指出的:“‘小地点’形成了得以考察社会学和文化‘大’问题的脉络。因为,这样的大问题或所谓的大变化——如资本主义的兴起,现代世界体系的成立,以及土地贵族的式微——也会在地方有所体现,也会有从微观角度才可以看见的有意和无意的后果。此外,围绕全球的社会空间网络,最终还是汇集于地方。”

到了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类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派就转向对宏观过程或宏观历史的分析。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旧名称,用以称呼“与历

史学、政治学和国家理论不可分割的经济研究”。之后,当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从政治经济学脱离出来后背弃了政治经济学,转而集中研究个人间的互动(初级群体及次级群体、市场和治理过程中的个人互动),因而“他们也远离了对严肃问题的关怀即生产、阶级和权力的实质”。因此,政治经济学派(涉及政治经济问题的民族志)为了克服这一缺陷,他们“试图通过将人类学家通常所研究的小规模社会的变迁与外在于这些社会的大规模的历史发展(尤其是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扩张)联系起来的方式来理解这种(小规模社会的)变迁”。

政治经济学派受马克思主义、弗兰克“低度发展理论”以及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影响,将注意力转移到“大规模的区域政治—经济体系”,同时他们“试图将这种关注与在特定社区或微观地区的传统田野工作结合起来,但他们的研究通常体现为探讨资本主义对这些社区渗透所产生的影响”。因此,政治经济学派坚持“任何一个历史或民族志研究计划,只有把自己放在较大的世界政治经济历史框架中,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因而他们“努力在微观过程的描写中,注意较大世界历史潮流和趋势的图景”。英国人类学家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威利斯研究的是英国工人阶级子弟的反学校文化,书的第一部分是民族志,即关于英国汉默镇的个案研究;第二部分的分析则将民族志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经济框架下进一步分析。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个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只有将民族志放在大的框架下,才能真正理解民族志的内容;另一方面,只有通过民族志,才能真正理解宏观过程对社会行动者的影响。

玛丽莲·西佛曼和 P.H. 格里福:《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志的传统——个人、历史和知识性的考量》,西佛曼、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33、34页,第34、35页。

P. H. 格里福:《基尔肯尼郡南部的商店主和农民——1840-1981》,西佛曼、格里福编:《走进历史田野——历史人类学的爱尔兰史个案研究》,贾士蘅译,台北:麦田出版社,1999年版,第229、230页。

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16页,第118、119页。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刘传珠、杨玉静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页。

Sherry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26, No.1 (Jan., 1984), p.158.

Sherry Ortner, 'Theory in Anthropology since the Sixties', 141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30-32页。

保罗·威利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秘舒、凌旻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政治经济学派还注意到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正如人类学家乔治·马尔库斯和米开尔·费彻尔所言:“区域性分析因而应该不仅涉及到有关何地发生何事方面的地理经济‘勘测’,也应该涉及到关系到权力联系的结合方式以及意识形态、世界观、道德代码的对立冲突、被区域性限定的知识和权力状况。”这种对权力的关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中程的概念,以整合地方的语境和更大范围的语境。因此,很多人类学家将研究的主题放在地方史与全球史交汇点上。这种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反对传统人类学将地方作为分析单位,否认地方是一个自治的、自我组织的实体,而是关注于支配和从属、地方和全球体系。

政治经济学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汇,因为它们强调历史在人类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关注“历史”,或者说关注过程和变迁。美国人类学家埃里克·沃尔夫和西敏司是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他们通过全球视野来理解地方史,他们的历史方法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将地方社区视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过程的产物,并在全球视野中理解这些过程;在地方互动和关系的交叉以及国家和帝国形成的大过程中理解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形成。

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中,“希望能够勾勒出商业发展和资本主义的一般过程,同时也关注这些过程对民族史学家和人类学研究的小群体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沃尔夫认为,他所进行的是“一种新的历史取向的政治经济学”。他在书的最后总结了自己的观点:“我们不能再将社会看作孤立的、自足的系统。我们也不能再将文化想像成一体化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个部分都要为维持一个有机的、自主的和永久的总体作出贡献。只有实践和观念的文化丛,一定的人类行动者在一定的环境中……在行动过程中,这些文化丛永远都处在不断的组合、解体和重组之中,在不同的

声音中传达着群体和阶级的不同道路。”因此,沃尔夫的目的是要考察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的殖民遭遇。

但是,沃尔夫的结论与他的初衷是相悖的,他一方面让我们将“没有历史的人民”视作历史主体,然而他实际向我们显示的却是,他们是“如何被强行纳入更大体系之中遭受冲击并变成其代理人的”。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在《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一文中对此进行了批评,他试图将这种单向的关系扩展为一种双向的关系,即不仅要描述资本主义体系对土著的影响,还要描绘土著本身对外来影响的反应。在这篇文章中,萨林斯关注于太平洋群岛及其邻近的亚洲和美洲大陆人民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这一阶段“如何以互惠方式形塑了资本主义的‘冲击’,从而也形塑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西敏司的《甜与权力》则通过蔗糖的历史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各个地区(无论是宗主国还是殖民地)的影响。西敏司在书中描绘了蔗糖在近代西方的历程,是如何“从1650年的稀有品、1750年的奢侈品,转变为1850年的生活必需品”。但这本书并非仅仅是关于糖的历史,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因为“蔗糖无论就其生产还是消费而言,都处在资本主义的意图的交汇点上”。例如,近代英格兰的普通百姓不得不把茶和糖这两种“从地球上遥远的两端进口的”物品作为日常饮食,这“向我们展示了已经在大范围地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英国经济,也在于它向我们暴露出在殖民地与宗主国城市之间,由资本所打造的密切关系”。^①西敏司进一步解释道:“欧洲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间在饮食和消费模式上的复杂变化并非是随意或偶然的,而是同一动因的直接结果,这一动因创造了一种世界经济,塑造了宗主国中心城市与其殖民地、卫星国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同时在技术和人力两个方面塑造

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135页。

Aletta Biersack, 'Introduc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nthropology', Aletta Biersack ed., *Clio in Oceania: Toward a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91, 11.

William Roseberry, 'Political Econom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Vol.17 (1988), 163.

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32页,第1页,第457页。

马歇尔·萨林斯《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地区》,赵丙祥译,张宏明校,载《历史之岛》,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页;埃里克·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第32页。

马歇尔·萨林斯《资本主义的宇宙观——“世界体系”中的泛太平洋地区》,第365页。

^①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朱健刚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48页,第192页,第120页。

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庞大生产机制和分配机制。”因此,蔗糖的历史展现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出现,也展现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如西敏司在最后总结道:“英国的工人第一次喝下一杯带甜味的热茶,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型,预示着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重塑。”

但是,沃尔夫和西敏司的研究远离了美国文化人类学的解释传统,忽略了“文化”,他们“将文化降级为一个附属的结构,把文化人类学者本身当成唯心论加以抛弃”。美国人类学家迈克·陶西格的《南美洲的魔鬼与商品拜物教》就试图跨越“人类学研究中解释传统和政治经济学传统之间的鸿沟”。这本书描述了哥伦比亚和玻利维亚农民成为无产阶级(种植工人和矿工)并被整合进货币经济时的反应。陶西格的切入点是一些无产阶级民间信仰中的“魔鬼”,“魔鬼”是“这些农民成为无产阶级时所体验到的异化的一个很好的象征”,而陶西格的任务就是要解释这一体验,说明魔鬼的形象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关系,即这些信仰(魔鬼)如何成为表达对新的生产模式的抵抗的途径。

二、从微观史到全球微观史

事实上,即使是微观史家自己也不仅仅关注于局部的、微小的个案研究。意大利历史学家吉多·鲁格埃罗就反对“微观史学通常是对一个档案案例的解读”的观点,指出“大多数微观史学都是在大量档案研究基础上的集中探讨”。微观史家试图通过个案研究展现大的历史背景,因此微观史学研究那些被传统研究方法所忽略的人群,并且要“在绝大部

分的生活所发生于其中的那些小圈子的层次上阐明历史的因果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在《蒙塔尤》(Montaillou, 1975)中写道:“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

针对个案研究的意义问题,卡洛·金斯伯格用埃德尔多·格伦迪的“正常的例外”(normal exception)作为解释。“正常的例外”有两个含义:独特的文献和真正例外的文献。对于第一点,金斯伯格认为,尽管微观史家研究的只是独特的文献,但是近代早期绝大多数审判都是“针对极为普通通常不重要的罪行”,因此特定类型的违法行为是正常的。而且,这些违法者往往是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绝佳代表。对于第二点,金斯伯格认为,如果资料没有提及或歪曲了底层的社会现实,一份真正例外的文献(在统计意义上而言)“可以比一千份典型的文献更具启示性”。

金斯伯格认为,微观史学一方面能够重建真实的生活,另一方面展现了能反映这种真实生活的无形结构。金斯伯格将微观史学和普遍意义上的历史定义为“关于真实生活的科学”。在金斯伯格自己的微观研究中,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宏观的旨趣。

第一,《奶酪与蛆虫》中的梅诺乔尽管只是一个不重要且不具代表性的普通人(“一个来自模糊世界偶然被我们发现的碎片”),但“仍可以作为一个缩影从中发现在某个特定历史时期里整个一个社会阶层的特征”。^①

第二,口头文化和书写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和大

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第158页,第210页。

乔治·马尔库斯、米卡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123页,第127页。

Michael Taussig, *The Devil 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South America*,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 xv.

吉多·鲁格埃罗:《离奇之死——前现代医学中的病痛、症状与日常世界》,载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4页,注释。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何兆武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5、126页。

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许明龙、马胜利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28页。

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Unequal Exchange and the Historiographic Marketplace',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1, 7-8.

Carlo Ginzburg and Carlo Poni, 'The Name and the Game', 8.

^①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0, xx, xxvi.

众文化之间的关系。梅诺乔这个人本身就处于口头文化和书写文化以及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交叉点上,他根植于大众文化之中,但同时又受到精英文化的影响。在关于“本南丹蒂”的研究中,金斯伯格试图表明近代早期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张力:民间信仰在官方的影响下,被重新界定,并纳入到精英文化(恶魔崇拜),而逐渐丧失了最初农业崇拜的因素。金斯伯格在文献中发现了“存在于法官审讯中的潜在印象和被告人真实证词之间的鸿沟”,因此他试图向我们展现“后来蜕变、又被知识阶层计划的叠加给抹杀的真正民众阶层的信仰”,并试图说明“一种像本南丹蒂迷信那样带有如此明显的民间特质的信仰是如何在调查官的压力下蜕变,以传统巫术的特殊相貌而告终”。因此,金斯伯格的旨趣不仅仅是探讨近代早期弗留利地区的巫术问题,而是“复原这一时期农民的心理状况”。

第三,从宏观的视角讨论巫术信仰的形成。在《夜间的战斗》中,金斯伯格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将“本南丹蒂”信仰放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考察,试图展现巫魔会与农业崇拜和亡灵游行之间的关系。金斯伯格在1989年出版的《出神》(Ecstasy)一书中运用形态学方法,通过比较和分析欧亚大陆与巫魔会相似的诸多仪式和观念,从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巫魔会观念形成的问题:(1)巫魔会观念是亡灵游行(processions of the dead)和丰产战斗(battles for fertility)这两个主题的融合,两者都存在有“萨满式的出神”(shamanistic ecstasy),正是基于这一共同的因素,两者在“本南丹蒂”信仰中得以融合。(2)巫魔会观念是精英文化(宗教裁判官和世俗法官观念中的“由一个宗派或敌对的社会所密谋的一个阴谋的主题”)和大众文化(“根植于民间文

化中的诸如魔法飞行和动物变形等萨满的因素”)的结合,两者在中世纪晚期的阿尔卑斯山地区得到了融合,而且由于裁判官的介入而得以广泛的传播。在这里,金斯伯格建立了一种结合结构主义和传播论的形态学,他称之为“支序分类学”。支序分类学是借自生物学的一个概念,它指生物不是在进化尺度上依据形态上的相似性来进行分类,而是依据共源性来建立演化树的分支顺序。支序分类学运用在文化现象上则指:“来自不同社会的各种现象间的共源性,在经过结构分析的识别后,必须再受历史学家的评价,以便辨识出那些真正的联系”。

微观史学根据其研究的侧重可分为文化微观史和社会微观史两类。文化微观史以金斯伯格为代表,他通过对审判记录的研究,揭示精英和大众文化的相互关系。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了社会微观史,它试图展现“边缘人群的行为是如何被用来说明权威的本质”。意大利历史学家乔万尼·列维是社会微观史的代表,他在《继承权力》(Inheriting Power, 1985)一书通过描述一位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普通乡村牧师乔凡·巴蒂斯塔·奇萨,向我们揭示了“乡村中权力关系的模式”,而这其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对难以捉摸的象征性的财富(即权力和威望)的保持和接受”;同时,列维“根据教区文件、土地税测定数据和其他行政机构文献的集成来重建被奇萨施以魔法的人们的生活和社会背景”。从列维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微观史的两个特点:(1)关注于权力关系,这种研究旨趣无疑也受到人类学的影响。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这种对权力的关注为政治经济学派提供一个中程的概念,以整合地方的语境和更大范围的语境。(2)关注于考察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列维认为,奇萨的故事可以“重建乡村的社会和文化环境”。2012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xxii-xxiii.

卡洛·金斯伯格:《夜间的战斗》,朱歌姝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意大利文版序言,第3页。

Ecstasy一词根据不同语境可以翻译为“出神”、“入迷”、“狂喜”等,汉语中没有一个单独的词可以涵盖所有的含义,在金斯伯格的著作中,该词主要指灵魂离开身体,因此在这里姑且译为“出神”。

Carlo Ginzburg, *Ecstasies: Deciphering the Witches' Sabba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13-14. 300. 22.

Edward Muir, 'Introduction: Observing Trifles', Edward Muir and Guido Ruggiero eds., *Microhistory and the Lost People of Europ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91, x xv.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第128、129页;Giovanni Levi, *Inheriting Power: The Story of an Exorcist*, tran. Lydia G. Cochran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xiii-xviii.

Giovanni Levi, *Inheriting Power: The Story of an Exorcist*, tran. Lydia G. Cochran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xvi.

年,列维在《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一文中指出,“微观史并不排斥宏观叙事,对小范围事件或人物的历史的关注也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一般真理的探寻”,“微观史并非是通过观察一般的社会背景来抽象出历史事实,而是尝试通过对个案的细致研究,设立一系列基础性的问题,这些问题能使我们在重塑历史的过程中部分性地保留包含全部真相的重要细节片段”。

同时,近十年来,人类学关于地方史和全球视野的路径也影响到了历史学研究,出现了全球视野下的地方史书写或全球微观史,娜塔莉·戴维斯的《骗子游历记》和琳达·科利的《伊丽莎白·马什的考验》以及欧阳泰的《一个中国农民、两个非洲男孩和一个将军》和约翰·保罗·贾布里勒的《巴比伦的埃利亚斯的秘密生活和全球微观史的应用》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无论是在戴维斯和科利的著作还是在欧阳泰和贾布里勒的论文中,我们都可以发现全球微观史的一些共同特点:“聚焦于某个在文化间游走的人,并通过其经历探寻跨文化联系和全球转型。”

(一)全球微观史的主题都是考察普通的个人在不同文化间的经历。《骗子游历记》的主人公是北非穆斯林阿尔·哈桑·阿尔·瓦桑,他在1518年被海盗俘获并被献给教皇,他皈依了基督教,并在罗马生活了九年,期间用拉丁文发表了有关非洲的著作。《伊丽莎白·马什的考验》则描写了一位十八世纪英国女性非凡而流离的生活,其足迹遍布四大洲。贾布里勒论文的主人公是一位中东的基督徒埃利亚斯,1668年他离开巴格达来到欧洲和美洲游历。这一主题其实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胡若望的疑问》一书中就可以看到影子,书中描述了一位十八世纪初的普通中国天主教徒胡若望在法国的经历。欧阳泰论文中的主人公则是十七世纪台

湾一个普通农民赛义德,尽管他并没有像胡若望那样离开中国,但是他的故事背景却是处于中国和荷兰两种不同文化的交错之中。

(二)全球视野下的地方故事。全球微观史不是仅仅将视野集中在所描述的个体的经历上,而是要将他们的经历放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欧阳泰笔下所描述的尽管只是一个普通中国农民,但是他的故事让我们一窥“另一个战争和全球化的世界”。同样地,其他全球微观史的论文和著作也是如此。贾布里勒认为,埃利亚斯的故事能与全球史的研究产生共鸣,尤其是研究近代早期世界的联系。娜塔莉·戴维斯在《骗子游历记》一书的引言中如此概括她的写作目的:

我试图将阿尔·哈桑·阿尔·瓦桑尽可能地完全地置于十六世纪的北非社会中,那里有柏柏尔人、安达卢西亚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黑人,以及正不断侵蚀他们边界的欧洲人,试图阐明他对于外交、学术、宗教、文学和性的看法,他带着这些看法来到了意大利,试图展现他对于欧洲基督教社会的反应——他所了解的、感兴趣的和感到困扰的、他所做的、他是如何改变的,尤其是他在那里是如何写作的。我描绘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具有双重视野、经受着两个文化世界、时常想象有两类读者、使用取自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技巧并用自己的方式揉入欧洲的因素。

娜塔莉·戴维斯在2010年的讲演中以十四世纪末十五世纪初的两位人物(伊本·卡尔敦和克里斯汀·德·皮桑)为例来说明全球视野下的地方史书写,她说道:“聚焦同一时代却生活在地中海两岸的两个革新人物,我试图扩展历史学家通常在其中反思知识生产和传播的地理和文化架构,我努力既不偏向欧洲基督教的背景也不偏向北非穆斯林的背

乔瓦尼·莱维[乔万尼·列维]:《三十年后反思微观史》,《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第106、107页。

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Toward a Global Microhistory',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Vol.21, No.4, 2010, 574.

Natalie Zemon Davis, *Trickster Travels: A Sixteenth-Century Muslim Between Worlds*,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8.

Linda Colley,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A Woman in World History*, Anchor Books, 2007.

John-Paul A. Ghobrial, 'The Secret Life of Elias of Babylon and the Uses of Global Microhistory', *Past and Present*, No.222 (Feb., 2014).

史景迁:《胡若望的疑问》,陈信宏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Tonio Andrade, 'A Chinese Farmer, Two African Boys, and a Warlord', 590.

John-Paul A. Ghobrial, 'The Secret Life of Elias of Babylon and the Uses of Global Microhistory', 56-57.

Natalie Zemon Davis, *Trickster Travels*, 12-13.

景,并且把女性的经验作为另一种选择加以呈现,而不视其为落后于男性的存在。”戴维斯目前正在进行的写作也是关于宏观视野下的文化交错。

同样,科利通过伊丽莎白·马什的传记讲述了“三个相互联系的故事”:马什的故事、与她家庭相关的故事以及全球的故事。在全球的故事中,伊丽莎白·马什生活的是“世界历史中一个独特的且尤为暴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大洲和大洋间的联系通过多重的方式被扩大和改变了”,全球视野下的这些变化“不断形塑和改变了马什个人的生活进程”。因此,科利这本书的目标是“描绘一个人一生中的世界和世界中的一个人的一生”,同时科利“将重塑和重估传记作为一种加深我们对全球之过去的理解”。

可见,全球微观史提供了一个将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相结合的极好的例子,正如有学者所评论的:“微观层面的分析能够使人更好地理解共时性的历史进程,比如全球化进程中的网络的功能、跨文化联系互动,以及更为广泛的——历史人物在全球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全球微观史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两个人类学研究趋势有着相似之处:政治经济学派。如前所论,政治经济学派将民族志的研究放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而且政治经济学派和全球微观史一样都关注于全球时代的他者或异文化遭遇。物的人类学研究(anthropology of things)。物的人类学研究和微观史一样都使用传记的方法,它将物视为与人一

样具有社会生命,因而致力于描述物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生命历程。西敏司的《甜与权力》可视为政治经济学派和物的人类学这两种人类学研究趋势的交叉。

结 语

人类学家萧凤霞在2009年的《反思历史人类学》一文对历史人类学进行了多重的反思,其中要求人类学超越地方性,关注跨地方性,并在亚洲的相互联系中思考地方性。由于地方性是田野工作的基础,因此人类学家无需为地方性的合法性辩护,全球性和相互联系只是给人类学家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视角。与人类学的情况不同,微观史学自出现以来就一直受到质疑,而微观史家也需要不断为微观视角的合法性辩护。全球史兴起后,历史学家们试图调和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之间的矛盾。历史学家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在《历史学宣言》一书中宣称,“短期”的观念已经对现代生活和人文学科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因此,古尔迪和阿米蒂奇要求历史学家回归传统的长时段研究并关注大图景,但这是一种新的长时段研究,一种通过结合大过程和小事件以及宏观视角和微观视角来关注大图景的长时段研究。卡洛·金斯伯格所说的代价也许并不是必须付出的,全球微观史正是一种结合微观视角和宏观视角以及克服微观史学碎片化的可行途径。

Natalie Zemon Davis, 'Decentering History: 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 *History and Theory*, 50 (May, 2011), 197.

周兵《全球视野下的文化史书写——解读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去中心的历史”》,《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2期,第41页。

Linda Colley, *The Ordeal of Elizabeth Marsh*, xix.

布莱斯·科萨特:《“全球背景下的人生故事”:以传记方法书写全球史》,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七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7页。

Arjun Appadurai ed.,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萧凤霞:《反思历史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学刊》,第七卷第二期,2009年10月。

Jo Guldi and David Armitage, *The History Manifesto*,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13, 117-118.